

第一章 特立尼达的中国律师

太平军将士之后

陈友仁(尤金·陈)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

特立尼达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岛国,隔帕里亚湾与委内瑞拉相望,岛上物产丰富,风景宜人。相传1498年哥伦布第三次航海时发现了这个岛,因岛上有三座峰,西班牙语中“三座峰”读作“特立尼达”,故得此名。岛上主要是黑人和印度人,官方语言为英语,信仰天主教与基督教,1802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直至1962年才获独立。

陈友仁的家世充满传奇色彩。父亲约瑟夫·阿陈原名陈桂新,^①广东顺德县人,是个穷木匠,以手艺出众和侠义而远近闻名。后因遭到官府和恶霸的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落到广西象州。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在“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旗帜下,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加入了

王炳毅:《早年外交家陈友仁》(台湾)《传记文学》第67卷第2期。

“拜上帝会”，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血气方刚的陈桂新也拿起武器，参加了太平军，任木工营副指挥。他充分运用其出色的木工技术，创制出了简易的木船，并为架设武昌至汉阳的江上浮桥出了大力，几次受到东王杨秀清的嘉奖。1854年，陈桂新升为水军后三军军师，他身先士卒，亲自指挥部队在长江上与清军作战，在一次恶战中受了重伤，不得不截肢，装上了一条用软木制成的假腿。1864年，天京（南京）失守，他随侍王李世贤的部队南撤，经福建进入广东，后因战败逃到香港。

1866年，他为逃避港英当局的追捕，隐姓埋名，以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当伙夫为条件，跟随该轮船来到了西印度群岛的英属牙买加岛。在那里他人地生疏，只能以理发为生。后来他又来到法属马提尼克岛，这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多火山岛屿，167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自19世纪起，法国殖民者逐渐将华工运往那里进行经济开发，1846年该岛成为法国的海外省。陈桂新独身一人来到这里，举目无亲，倍感孤独。但是，他很快认识了华侨少女梁玛丽，小伙子的正直勤劳，姑娘的善解人意，使他们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不久就结成百年之好。历经磨难的陈桂新终于有了一个幸福的家，但霹雳火山的威胁却使他们不得安宁。19世纪60年代末，他与岳父全家一起迁往英属特立尼达岛，在该岛的南部定居下来。

特立尼达是个恬静的海岛，景色优美，土地肥沃，还盛产石榴、菠萝、甘蔗和木瓜，这使远离家乡的陈桂新犹如回到了广东，很快爱上了这个风和日丽的地方。他身处在这宜人的新家园，又有贤惠的妻子相伴，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决心要用自己的双手使全家人过上好日子。时间在流逝，陈桂新的愿望也在渐渐地实现。而在他身上发生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把自己的姓氏从“陈”变成“阿陈”，而这个改变完全是由误会所造成的。原来他到移民

局注册时，那里的官员询问他姓什么，他先随口应了声“啊”，然后又用广东话答复“陈”，于是他的姓氏被记录为“Achen”即“阿陈”。善良的陈桂新既没有立即纠正这个错误，也没有向他的儿女们挑明真相，由此移民局官员的失误竟变为既成事实，以至于当他的大儿子陈友仁在特立尼达出世时，其名字也被注册为尤金·伯纳德·阿陈（Eugene Bernad Achen）。直到若干年后，陈友仁回到中国“寻根”，才发现自己的真实姓氏原来是“陈”。

陈友仁的母亲梁玛丽，原籍香港新界边境线附近的浦安县城，她是家里的长女，另外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1860年，为了躲避连年的战乱，玛丽跟着父母逃离中国，来到了美国夏威夷，但在那里仍然受到歧视，因此他们继续向西进发，然后南下，最后定居在马提尼克岛。就在那里她遇到了陈桂新，并很快结为伉俪，然后一起移居到特立尼达岛。玛丽是中国人，出生在广东，以前并没有人对此产生怀疑，但当陈友仁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国外有些书刊却对这个问题大感兴趣，有的甚至得出了玛丽不是中国人的结论。且不说陈友仁的儿子陈丕士、陈依范、女儿陈茜兰都在其自传和自传手稿中一致否定这种结论，即使是美国和英国的官方文件也明白无误地证明玛丽是中国人。1927年7月6日，在美国驻北平公使提供给英国公使蓝普森的秘密报告中确认“尤金·陈是完全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是来到特立尼达的中国人，而他的母亲是到马提尼克的中国人，他的父亲在那里遇见她”。^①1927年1月20日，英国驻特立尼达总督H·Byatt爵士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个报告中，汇报了对于尤金·陈及其家庭的调查结果：

我最近注意到新闻电报中经常提到与驻汉口外国代表们

陈一文（陈友仁的嫡孙）：《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由陈一文提供。

谈判的首席中国代表尤金·陈的名字，由于我对这个名字比较熟悉，因此我指示在特立尼达开展调查，以便搞清该人是否与长期在这里定居的一个著名的中国家庭有联系。结果发现确实如此，希望这能使外交部有兴趣。我在此附上我能够收集到的关于这个家庭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由王国政府的律师为我收集的。

该家庭的父亲是一个称为 Achen 的移民，当他的孩子们还很年幼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其寡妇将他们抚养大。她在 San Fernando 镇保留的一个杂货店，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是纯粹中国血统，名字为：

- (1) 尤金·伯纳德·阿陈 (Eugene Bernard Achen)
 - (2) 约瑟夫·雷昂·阿陈 (Joseph Leon Achen)
 - (3) 雷昂·大卫·阿陈 (Lionel David Achen)
 - (4) 阿弗莱德·布鲁诺·阿陈 (Alfred Bruno Achen)
- 所有这些孩子都在特立尼达出生，因此为英国公民。^①

玛丽个子不高，大约只有 152 厘米，但却充满活力，并很有个性。她的幼年是在广东农村度过的，那里的姑娘都以脚小为美，而当她的父母试图给她裹小脚时，她高声叫喊以示反抗，父母只得作罢，让她留下了两只大脚。玛丽很勤劳，一双手总是闲不住，即使进入老年以后，也常常拿着大砍刀，把花园里的灌木和树清理得整整齐齐，直至 75 岁她还自己管理着商店。玛丽也很善良，富有同情心，特别当她的家致富以后，常常接济周围的穷人，是特立尼达远近闻名的慈善家。但是玛丽对中国却充满了恐惧，那连年的战乱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为此她从来

陈一文：《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

不和孩子们讲中文，甚至希望完全忘记她的家乡。

阿陈和玛丽来到特立尼达后，先是作契约劳工，夫妻俩勤勤恳恳地劳动，并尽一切可能地省吃俭用。当他们终于结束契约时，总算有了一笔小小的存款，于是他们买下了十字路口处的一小块地，在上面种植蔬菜、可可以及椰子树，后来又经营了几个零售店。两个年轻人硬是凭着一双勤劳的手，在异国他乡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小窝，并满怀喜悦地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陈友仁。

陈友仁是在一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父亲的正直勇敢，母亲的勤劳善良，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父亲常常给他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更使他形成了嫉恶如仇、果断坚强的性格。他是家里的长子，父母对他倍加疼爱，但他并不娇惯，从小就很有毅力，善于吃苦，尽管当时家里已经比较富裕，但他还是经常主动参加家务劳动。他聪明好学，勤奋刻苦，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令人遗憾的是当陈友仁刚满 13 周岁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但是辛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总算留下了一些遗产，那就是特立尼达南部的几个杂货店。陈友仁的母亲是个坚强的女人，丈夫早逝的打击并没有把她压垮，看着一个个年幼的孩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她挺起腰杆，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不但要照料杂货店的生意，还要抚育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大成人，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于是她只得把几个杂货店交给她的兄弟去经营，但是这个决策却使她损失惨重，因为她的兄弟并不善于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每况愈下，眼看濒临倒闭。玛丽当机立断，收回了经营权，最终保全了在圣·费尔南多的一个杂货店。

陈友仁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逐渐造就了百折不回的坚强性格和富有责任心的良好品德。他看到整天操劳的母亲已过早地出现了白发，感到自己作为家里的长子，有责任为母亲分忧。

从此他每天放学后总是先帮助母亲照料家务，带领弟妹，并和母亲一起把家里椰子树上的椰子敲下来，做成甜椰子糕，然后再拿到十字路口的小摊上去卖。晚上，当他帮助母亲忙完家务后，才在灯下做作业。父亲的早逝，使陈友仁俨然成为家中的顶梁柱，过早地品尝到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他比同龄人更为成熟，这无疑为他以后从事律师职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兴 旺 的 律 师 事 务 所

陈友仁出生以后，望子成龙的双亲对长子寄予厚望，从小就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开始是在圣·弗尔南多镇的地方学校读书，由于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很快在班上脱颖而出，颇得老师喜爱。后来由于父亲的逝世，陈友仁在读书之余，还要帮助母亲做家务，但尽管如此，他的学习成绩仍能保持优秀，这使老师和母亲都认识到他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又被送到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主修法律专业。这所学院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学习氛围，都较之地方学校好。在那里陈友仁如鱼得水，学习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很快又成了圣·玛丽学院的优秀生，并荣幸地获得了学院颁发的助学金。

当陈友仁以优异的成绩从圣·玛丽学院毕业时，当地一位著名的律师艾德嘉·玛雷斯·史密斯看中了他，主动提出愿意接受他当徒弟。玛雷斯·史密斯先生是个有正义感的律师，他领导了1903年西班牙港的“水骚乱”暴动。当时那里的统治当局通过了一项征收水税的法律，许多老百姓对此十分不满，但又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律师挺身而出，明确提出经选举产生的议会议员们应该对殖民地的财政收入如何使用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应该反对收取这类税赋。虽然这次反抗

在统治当局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史密斯先生成了群众心目中的英雄。陈友仁师从这样的老师，不但学到了业务知识，更学到了做人的原则。真可谓名师出高徒，陈友仁在玛雷斯·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不但在律师业务方面进展很快，而且已开始向当地的报社投稿，这是他日后成为新闻记者的最初实践。经过 5 年的实习，1899 年他终于在特立尼达与多巴哥高级法院获得初级律师、转让证书者和公证员的资格，于是年方 21 岁的陈友仁成为特立尼达第一个华人律师。

年轻的陈友仁踌躇满志，立志在事业上大干一番。他获得律师资格后，在圣文森特大街警察局附近法院的红房子对面，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并“没有华丽的装饰，它是一幢发黄拉毛水泥墙面的一层建筑，它有一个棕榈树遮荫的良好封闭的院子，还有几个大的香蕉棕榈树；大部分地面铺有板石和树影，通过双门入口走进以后，你会发现你将面临一个栏杆，后面坐着几位打字的工作人员。你告诉他们你的业务以后，可能由他们处理你的事务，或者他们将把你引入办公室的更里边，在那里每个合伙人各自有自己私人的办公室，虽有些拥挤但较为整齐”。^① 事务所一开张，陈友仁就把其宗旨定为：“建立友好、有效及诚实的信誉”。有志者事竟成，陈友仁凭借其扎实的业务能力，认真负责的办事态度，赢得了客户的信赖，特立尼达的大部分华人和印度人，很快成为他的长期客户，他的事务所也成为当地有名的事务所之一，专长于房地产销售和转让的法律事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友仁的事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经济上也日益富裕。他先后在几个可可种植园投了资，并出资购买了曼萨尼拉区的圣·伊希多尔椰子种植园。这个种植园不但面积很大，

陈依范（陈友仁的小儿子）：《自传手稿》，未刊稿，第 39 页，由陈一文提供。

而且产量特别高。他独具慧眼，首批购买了拉布雷亚油田的股份，结果在短期内很快升值。这些投资每年都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加之他那日益发展的律师事业，使他一跃而为特立尼达的著名人物。他成名后不久就在圣·科来尔布鲁米大街建造了一座新房子，这是用混凝土和石块建成的，其石块都是从附近的巴巴多斯岛进口的，整幢建筑既豪华又牢固，在当时的西班牙港是独一无二的。这幢新房子还有一个漂亮的马厩，养着几匹良种马。在当时的特立尼达，马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一些有身份的人都拥有好马。陈友仁最喜欢其中一匹美洲种的骏马，这是当时最时髦的快马，也是特立尼达罕见的良马之一。这匹骏马浑身发亮，气宇轩昂，马的前蹄钉着橡胶马掌，每天它都以优美的跳跃步态，乘载着陈友仁往返于他的事务所和寓所之间。陈友仁还喜欢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到空气清新的乡间去散散心，为此他还在巴里亚湾的一个岛屿上买下了一座别墅。

陈友仁并不拘泥于习惯定势，而是敢想敢为，在当时仍比较保守和封建的特立尼达，他是第一个雇佣女秘书兼打字员的人士。那个女秘书名叫布兰奇·福尔，是克里奥耳人大家庭的一员，居住在圣詹姆斯附近的马拉维尔路。她仪态端庄，装束讲究，身穿白色的短外套和黑色的裙子，每天准时到陈友仁的律师事务所上班，这不能不说是当地传统势力的一种挑战。此外，陈友仁对宗教也有强烈的反感情绪，当他在圣·玛丽学院上学时，已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但作为学生又不得不遵守校纪校规，因此他也只能每天去参加圣餐会，并按时做礼拜和弥撒。可是当他一从学校毕业，就和教堂绝缘了。后来每当他的妻子和孩子到教堂做礼拜时，他总是把他们送进教堂后，自己坐在马车上，在教堂的院子里等着，一直等到礼拜做完为止。尽管近在咫尺，但他就是不愿意跨进教堂的门槛，这在信教蔚然成风的特立尼达，很

引人注目。

陈友仁在担任初级律师以后，就主动承担起了帮助弟妹们求学的责任，以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大弟弟约瑟夫是在加拿大完成学业的，他也和哥哥一样选择了法律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拜陈友仁为师，期满后也当了律师。后来陈友仁离开特立尼达到中国来了，他获得哥哥的代理权，继续经营陈友仁所创办的律师事务所，直至 1993 年他仍然住在特立尼达。二弟弟大卫毕业于西班牙的圣·玛丽学院，学的也是法律专业，他又拜约瑟夫为师，后来在新加坡当律师，晚年住在英国。小弟弟艾尔弗雷德也在圣·玛丽学院读书，毕业后到特立尼达高级法院任职，以后又在西班牙港市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唯一的妹妹玻娜迪娜就读于圣·约瑟夫女修道院，在那里她和天真活泼的阿尔弗赛娜·阿加莎·冈安图结识，并很快成为挚友。阿加莎后来与陈友仁结为伉俪，而她自己却终生未嫁，一直陪伴着她的母亲。作为家里的长子，陈友仁帮助弟妹们全部完成了高等学业，这在当时的特立尼达是屈指可数的。

美 满 姻 缘

陈友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妻子阿加莎就是他的初恋女友，说起他俩的相识还真富有戏剧性。当时陈友仁在圣·玛丽学院上学，每天放学总喜欢从学校后边小路上的后门出来，而阿加莎则在下一条街上的圣·约瑟夫修道院上学，下午也从同一条小路上的修道院后门出来，这与对面圣·玛丽学院的后门几乎相对。陈友仁的妹妹玻娜迪娜和阿加莎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有时在放学的路上和陈友仁相遇，就这样一回生，二回熟，陈友仁和阿加莎很快从相识相知到相恋。但是，当陈友仁向家里宣布他将娶阿加

莎为妻时，却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阿加莎是一位法国上层白人和黑人姑娘的私生女，她的父亲路易斯·冈安图是拿破仑的海军上将冈安图的后裔。在 1805 年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冈安图将军所在的法国西班牙混合舰队，被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击败，损失战舰近 20 艘，冈安图为了逃脱国王的严惩，不敢再回法国去，而是明智地继续向西印度群岛驶去，在马丁尼克岛隐居起来。以后，又举家迁往美丽富饶的特立尼达岛，在那里定居下来。阿加莎的父亲路易斯·冈安图并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承认阿加莎是他的女儿，让她继承法国白人家庭的姓氏，还出资安排她上学接受良好教育，因此阿加莎就成了圣·约瑟夫修道院中极少数有色人种姑娘中的一个。阿加莎的母亲是英属殖民地黄金海岸（今加纳）的一个黑奴。^①

阿加莎长得很美，五官清秀的面容，娇小玲珑的身材，开朗活泼的性格，使陈友仁为之倾倒。但是中国人对种族问题特别敏感，很少与其他种族联姻，陈友仁的婚事遭到了家庭和亲属的一致反对，于是这对恋人便联合起来，为争取幸福而展开了斗争。处事果断的陈友仁表示非阿加莎不娶，从小就具有反叛性格的阿加莎则准备拼命，而亲属这一方也不肯让步，双方陷入胶着状态。1899 年当陈友仁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一开张，他们就不顾家人的反对，立即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是温馨的，小夫妻俩共同呵护这得来不易的二人世界，新婚的小屋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由于律师事务所刚成立，陈友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贤慧的阿加莎则挑起了家务这副重担。她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对丈夫照顾得仔细

^① 由陈一文提供

周到，使陈友仁深深为之感动，他亲昵地称爱妻为“芳斯”。不久，美满的二人世界增添了一个新成员，他俩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他们给女儿起名叫“琼琳”。小琼琳长得很美，初为人父的陈友仁非常喜爱她，每天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抱琼琳。小琼琳也与父亲很亲热，父女之间的感情很深。可不幸的事发生了，在琼琳刚满 3 岁时，不慎被一匹烈马踢死了，这使陈友仁悲痛欲绝，他对琼琳的疼爱以后任何一个孩子都无法替代的。1903 年当他在圣·科来尔的布鲁米大街新建了一座混凝土的宅第时，将它命名为“琼琳”，充分表明了他对琼琳那刻骨铭心的父爱。

陈友仁夫妇继琼琳以后，又生了 7 个孩子，其中的老三、老五和老七都在婴儿和幼年时期就夭亡了，最终留下了 4 个孩子，即儿子陈丕士和陈依范，女儿西尔维娅和约莲达。陈友仁由于事业上的成功，积聚了很大一笔财富，这就为孩子们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陈友仁认为孩子的早期教育非常重要，这好比造高楼一定要打好地基一样，因此当大儿子陈丕士刚满 5 岁，陈友仁就为他请了一个家庭女教师，她的名字叫伊迪丝·麦克华伦，她一直教授陈丕士到 7 岁，然后陈友仁把他送到英国去上了一年学，回来后又进了女皇皇家书院。后来尽管陈友仁自己回中国去了，但他却嘱咐妻子一定要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最终他的儿女们都先后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且在事业上都颇有建树，其中陈丕士成了香港著名的大律师，陈依范是一名出色的画家，西尔维娅成为世界著名的舞蹈家，约莲达则成了一个电影摄影师，至今仍居住在俄罗斯。

陈友仁喜欢博览群书，观念超前，当特立尼达的人们还在祈求上帝保佑孩子之时，他却认为舒适的环境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才，就好比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一般，为此他每年都要安排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让孩子们到乡下去锻炼，而他所购买的圣伊

萨多可可种植园则是最理想的场所。那个种植园离西班牙港大约 30 英里，火车要行驶 3 个小时，那种田园诗般的境界是特立尼达所无法体验的。在那里，陈友仁和孩子一起到曼萨尼拉的高原举行野餐；在大西洋海岸美丽的银白色海滩上享受海浴；深入丛林中去采摘高大的巴拉塔橡树上的果实；在种植园的水池和沼泽中捕鱼和捞虾；还用气枪射猎鹿和刺猬。陈友仁还让孩子们和那里的农民一起参加收获可可豆荚的劳动，即先把可可豆在很大的木盘上布开，然后大家光着脚，在上面边跳舞边踩，直至把它们弄干。后来成为著名舞蹈家的西尔维娅在其回忆录中写到“这是对我跳舞经历的最早回忆”，真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陈友仁不但是个慈爱的父亲，也是一个非常开通的丈夫。结婚以后，阿加莎曾一度沉湎于家庭和孩子，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但陈友仁却不赞成妻子被家务所束缚，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对事业的追求，否则生活就会淡然无味。他深深地了解自己的妻子，觉得阿加莎在艺术上很有天赋，就鼓励她在这方面努力。于是，阿加莎在丈夫的支持下，雇了几个佣人，自己则从厨房走了出来，利用去英国度假的时间，进入斯迪曼的“演说、舞蹈与戏剧艺术学院”学习。这个学院当时在伦敦西点区沙福特斯伯力大街的风车路，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学院，几乎所有的英国舞台表演艺术家都毕业于这个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阿加莎潜在的艺术才能被挖掘出来了，她开始感到自己最适合两种职业，那就是当舞蹈艺术教师，专门教授踢踏舞和芭蕾舞，或者做舞台剧制作人，主要制作音乐喜剧、戏剧和歌剧。可惜特立尼达没有条件让她实现这个愿望，而她又不忍心丢下丈夫和孩子，离开家乡到英国谋求发展，因此她只能利用一切机会，把在伦敦学到的艺术搬到特立尼达来。当时的特立尼达是个闭塞的小镇，很多人整天忙于工作，根本不懂什么艺术，阿加莎成了小镇上的“大演员”，她常常表演

一些小歌剧、时事讽刺剧和音乐喜剧，有一年的狂欢节她还组织过一个小乐队。看到妻子重新活跃起来，陈友仁高兴地笑了。虽然他本人不善于表演，但他非常尊重妻子的爱好，有时还为妻子的演出计划出谋划策。每当阿加莎演出节目时，陈友仁总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准时来到演出现场，站在某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深情地欣赏她的表演。

家庭是个幸福的港湾，但有时也会风云骤起，顿生纠葛，特别是婆媳之间更易产生矛盾，每当这时候，陈友仁总能以他那宽容幽默的语言，使矛盾解决于萌芽状态。有一年，陈友仁的生日快到了，阿加莎想在那天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那就是在一块大玻璃上画一大束罂粟花送给他，以向他展示自己的绘画才能。当时阿加莎刚刚开始学画，因此这幅画花费了她很多心血。陈友仁生日那天，她把这幅画放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即画室沙发的中央，以期待陈友仁一走进画室就看到它。谁料还没等到陈友仁回来，专程前来祝贺儿子生日的婆婆玛丽却走进了画室，还没等阿加莎叫出声来，她已一下子坐到沙发上，并舒适地向后一靠，只听一下响亮的“咔嚓”声，阿加莎的杰作裂成两片。阿加莎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玛丽看到自己闯了祸，心里也很后悔，但她那倔强的性格和婆婆的尊严，又不愿意向儿媳道歉。这下阿加莎便火了，她怒气冲冲地拿起那幅破碎的画，干脆把它摔在地上。正当矛盾一触即发之时，陈友仁回来了。身为律师的他一看现场，立刻什么都明白了，他马上打趣地说：“寿星回来了，怎么不见生日蛋糕？我可早就想吃了！”孩子们一听也拍手叫了起来，阿加莎这才破涕为笑，“看你饿成这样，早就为你准备好了！”她连忙走出画室，招呼佣人开饭去了。就这样，在陈友仁恰到好处的协调下，一场干戈很快化为玉帛。

随着陈友仁事业的发达，他成了特立尼达的著名人物。他工

作顺利，收入颇丰，妻子贤慧，儿女活泼可爱，旁人看来他很幸福。但是陈友仁的内心并不平静，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太平天国的故事，常常萦绕在耳际，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以后，他对祖国的思念日益加深。他知道自己虽然拥有英国国籍，但终究是个中国人，祖国的成败兴亡和海外华侨息息相关。他秉承了父亲忧国忧民的美德，从小就胸怀大志，立志长大以后要干一番大事业。如今他的律师事务所虽然非常兴旺，但对自己的祖国却爱莫能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常使他激动不已。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越是富裕，越是应该关注贫弱的祖国。陈友仁非常尊重母亲，玛丽那勤劳善良和不畏挫折的优秀品质，曾对他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却不赞成母亲对待中国的态度。小时候他不明白她为何对自己的祖国如此恐惧，现在他才意识到母亲的恐惧其实是一种悲哀，这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母亲，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想离她而去，这种做法未免过于残酷。当然，他并不会责怪年迈的母亲，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勤劳和善良的玛丽都是无可挑剔的，而且战乱的祖国也确实给她留下了恐怖的印象。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知识的青年人，一个太平军的后裔，对危难的祖国决不应该是恐惧，而是负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于是，他不再安于特立尼达的舒适生活，开始把眼光转向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但是，特立尼达离中国实在太远了，他根本无法看到中国的报纸，只得千方百计地收集有关中国的最新报道。他特地购买了一套《伦敦新闻画报》发行的丛书，并每期订阅《斯特兰得》杂志，从中了解了当时发生的日俄战争，得悉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沈阳和旅顺口的暴行。他看到地大物博的东方大国竟成为列强蚕食的对象，气得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回中国，实现他的报国梦。

第二章 初涉中国政坛

与家人不告而别

陈友仁这个远居海外的赤子，心里时时牵挂着多灾多难的祖国。但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他真正动身归国竟是在英国度假期间突然决定的，而且由于时间紧迫，他对家人只能不告而别，体现了一腔爱国情。

1899 年，陈友仁在特立尼达开设律师事务所以后，经常为了业务到英国去，但那仅仅是短暂的出差，往往一办完事，就赶回特立尼达，因为他放心不下事务所那一大堆事情。但是，随着事业的迅速发展，他需要知识更新，特立尼达过于匮乏的文化已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为此他只得每年一次到英国去度假，以暂时摆脱那繁忙的律师事务，集中精力为自己“充电”。至于特立尼达的律师事务所，他完全可以放心地交给大弟弟约瑟夫，陈友仁已帮助他获得了律师资格。1906 年，陈友仁首次赴英国度假。1908 年，陈友仁又带着妻子和大儿子一起去度假，假期结束后，他还把儿子留在英国读了一年书。

1911 年秋天，陈友仁又像往年一样到英国去度假，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这个假期竟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那次他在伦敦遇到了老朋友菲律普·陶博士和伍连德博士，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刚传到伦敦，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三位青年彻夜难眠，一致认为为国效力的时候到了，他们经过反复斟酌，决定马上回国。眼看盼望已久的报国梦即将实现，陈友仁为之兴奋不已。但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归，想到贤惠的妻子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他又有些于心不忍，真想回去好好说服妻子，安排一下家里的事情，但理智告诉他绝不能回去，否则他将被儿女情长拖住手脚。他狠狠心，给妻子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她自己回国的计划，吩咐她把孩子们带到英国去接受教育，并让她转告大弟弟约瑟夫接替他经营好律师事务所。然后陈友仁和伍连德博士一起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于1912年初到达中国的古都——北京，不久菲律普·陶也来到了北京。

陈友仁的电报使阿加莎感到震惊，虽然她对丈夫的思乡之情有所了解，但想不到他竟会不告而别。她多想追随丈夫而去，但面对三个年幼的孩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她很快冷静下来，如今丈夫已回国效力去了，她只有把孩子们抚育成人，才是对远方的丈夫最好的支持。坚强的阿加莎很快擦干了泪水，开始为赴英准备行李，不久就和母亲戈林一起带着陈丕士、陈依范和西尔维娅到达了伦敦。初来乍到，阿加莎先在帕丁顿圣玛丽公寓大厦租了几间房间。这是当时伦敦的一种新式住宅，整幢大厦用红砖砌成，并带有庭院，位于埃奇韦尔路旁边，前面就是帕丁顿铁路的终点站，交通也十分便利。后来阿加莎又购买了圣约翰森林克利夫顿山 11 号的房子，于是全家又迁入新居，并一直住在那里，直到 1922 年返回特立尼达时才把它卖掉。

就这样，阿加莎带着孩子们在伦敦开始了新的生活，她根据三个孩子不同的情况，分别把他们送进了学校。尽管在当时的伦

敦有色人种地位很低，但因为陈友仁在特立尼达所拥有的财产，使他们完全可以安心地享受上等人的生活。但是经济上的富足却无法排遣精神上的失落，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加莎开始整天为陈友仁担心，脾气也变得急躁起来。懂事的孩子们理解母亲的忧虑，每天都会准时等候在门口，盼望邮递员能送来父亲的消息，但每天的结果都是失望。有一天晚上，孩子们都睡着了，但阿加莎却神色慌张地把他们叫醒，她告诉孩子们她刚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确信陈友仁不是危在旦夕就是死了，说着说着她伤心地哭了起来，孩子们也害怕地哭了，母子四人哭成一团，惊醒了已经入睡的戈林姥姥。饱经风霜的老人看着满脸泪痕的女儿，心都碎了。但她毕竟有过艰难的经历，性格十分坚强，她耐心地宽慰着女儿，告诉她上帝一定会保佑陈友仁这样的好人。阿加莎在母亲的劝慰下，才慢慢安静下来。

陈友仁的突然离别，使年迈的母亲伤心不已，大儿子是她最疼爱的孩子，自从丈夫去世后，陈友仁已无形中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如今他却不告而别，而且是到玛丽一直视为最恐怖的中国去了。玛丽看到陈友仁在特立尼达既拥有一份发达的事业，又有一个幸福的家，但他却要放弃旁人所羡慕的一切，回到落后和战乱的中国去。但她最了解儿子，相信他的选择是不会错的，因此宁可自己日夜思念，也不强求儿子回来看她，她只是每天掐着指头等，盼着有一天出现奇迹——儿子突然又回来了！但是陈友仁始终没有回来，而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消息却传到了特立尼达。当地的新闻记者闻风而动，立即前来采访玛丽。她在前花园接待了他们，但并没有因为尤金当了外交部长而沾沾自喜，而是喃喃地说道：“我那可怜的儿子尤金在中国，可怜啊！”^①当记者提出要

^① 陈一文：《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